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4.001

周琪、付随鑫：“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4期，第1-13页。

ZHOU Qi, FU Suixin, “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U.S. and It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acific Journal*, Vol.25, No.4, 2017, pp.1-13.

# 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周琪<sup>1</sup> 付随鑫<sup>2</sup>

(1.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2.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 100005)

**摘要:** 本文将从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和外来移民这三个方面分析全球化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及负面影响。虽然美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但全球化对美国的副作用越来越凸显,引起了中下层白人的反对,并导致特朗普在最近的大选中上台。反全球化激发的美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政策,将可能危害美国的现存体制和国际秩序。美国的例子说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塑造着当今世界,它既是一个发展趋势,也因其副作用而引起反全球化的反弹和来自原主要推动者的阻力。因此,全球化的副作用及反全球化的现象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美国;反全球化;自由贸易;移民;特朗普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7)04-0001-13

2016年是全球政治剧烈变动的一年,其中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要数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它连同英国脱欧、欧洲难民运动以及极右翼的兴起,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并可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而贯穿这些事件的一条主线便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主要表现为反对自由贸易和外来移民。在经济方面,全球化意味着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sup>①</sup>它确实能促进全球

范围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各国总体福利的提高。

然而,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中的全球化反对者认为,全球化造成了失业、收入下降、经济不平等、政治冲突、国家认同危机、犯罪活动和国家安全威胁等严重问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质疑全球化的人认为,“全球化话语是在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计划做辩护,并企图将它合法化。”这个计划就是:创造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并使得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主要经济区内大获全胜。于是,在他们看来,没有美国的霸权,促进近年来

**收稿日期:** 2017-02-04; **修订日期:** 2017-03-23。

**作者简介:** 周琪(1952—),女,北京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政治与外交、国际关系;付随鑫(1986—),男,湖北随州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政治与外交。

<sup>①</sup>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给出的全球化定义是:“全球化指的是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和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在广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入。它指的是人类组织在规模上的变化或变革,这些组织把相距遥远的社会联结起来,并扩大了权力关系在世界各地和各大洲的影响。”参见[英]戴维·赫尔德、[英]安东尼·麦克格鲁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这是一个涵盖全球治理的更为宽泛的对全球化的定义。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

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自由世界秩序就不可能稳固。因此,全球化被他们理解成为美国化的近义词。<sup>①</sup>但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的态度转变了。特朗普总统的反全球化立场意味着,美国“脱离自由国际主义阵营,改投了民粹民族主义阵营。”<sup>②</sup>

反全球化并不是新近出现的现象,但这次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曾一度是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美英等西方国家,现在却成了它的强烈反对者。本文将从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和外来移民这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历程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正负面影响。首先考察美国在两次全球化进程中的参与形式、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最终结果,然后分析当前全球化对美国产生的副作用,以及相当多的美国人反全球化的原因,最后探讨反全球化将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秩序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 一、美国参与全球化的历程

全球化是一个长期发展但晚近才得到关注的现象。人们一般在谈论全球化时,多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的现象,但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化,至少可追溯到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40多年时间。在“一战”爆发前夕,世界范围内商品、资本和人口的自由流动都达到一个历史性的高峰,堪与冷战后的情况相提并论。<sup>③</sup>当时各国商品出口总额占到世界GDP总量的8%,外国资本存量占到世界GDP的32%,而移民存量占到世界人口的25%。尤其是后两者的全球化程度堪与冷战后的情况相比,而且当前资本全球化的程度仍未达到“一战”前的最高水平。<sup>④</sup>

虽然这一时期英国是推动全球化的主力,但美国也充分参与其中,且带有一些延续至今的特点。对外贸易并不是当时美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因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维持着很高的关税,不过其商品进出口额通常也能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左右。<sup>⑤</sup>当时美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资本和人口的自由流动。

美国在“一战”前长期是资本净流入国,需要靠外国投资来平衡其经常账户赤字,而美国在19世纪后期建立起的金本位制度,有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是美国参与全球化最显著的特点,1920年前的半个世纪里,超过2600万移民进入美国,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重最高时接近15%。如后文所示,美国的这些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二波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得同样明显。

第一波全球化进程具有很多固有缺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遭遇了严重危机。美国不仅深陷其中,其政策还使危机更加恶化。1929年后的大萧条使美国重回贸易保护主义。为了保护美国的就业和产业,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税率最高提高至60%,这引发了各国的强烈报复,加速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崩溃。<sup>⑥</sup>金本位制是第一波全球化中保证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根本性制度。然而,“一战”爆发后英国立即放弃了它曾力推的金本位制,美国也于1933年步其后尘,结果导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资本流动受到严重阻碍。大规模移民亦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冲击,激起了强烈的反移民情绪,人口自由流动随着美国《1924年移民法》的实施戛然而止。到1933年,美国移民数量最低时每年仅有2.3万人,不到一战前高峰时的2%。<sup>⑦</sup>至此,第一波全球化落潮后的美国陷入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

① [英]戴维·赫尔德、[英]安东尼·麦克斯格鲁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② Francis Fukuyama, “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1,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6a43cf54-a75d-11e6-8b69-02899e8bd9d1>.

③ Laurence Chandy and Brina Seidel, “Is Globalization’s Second Wave about to Break?” *Brookings Institute*,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10/global\\_20161005\\_globalization-second-wave.pdf](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10/global_20161005_globalization-second-wave.pdf), p.3.

④ 同③。

⑤ [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美]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王钰、李淑清译:《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6页。

⑥ “The Battle of Smoot-Hawley,”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8, 2008,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2798595/>.

⑦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able 1. Persons Obtaining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Fiscal Years 1820 to 2015, <https://www.dhs.gov/immigration-statistics/yearbook/2015/table1>.

本土主义的困境,国内政治和国际秩序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从美国参与第一波全球化的经历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第一,全球化进程并非畅通无阻,也并非未出现逆转。第二,全球化可能对一个国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就美国而言,外国商品的涌入冲击了本国产业和就业,保证资本自由流动的金本位制极大地限制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大规模移民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民族国家与深度全球化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危机时刻,民族国家总会首先考虑自身利益。第三,当时各国的反应失当,而且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很好地调解矛盾,民族国家的利益轻易战胜了全球的经济的发展。

“二战”结束时,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汲取了第一波全球化和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对贸易和资本加强监管,避免过度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避免了大萧条期间损人利己的保护主义政策,支持有限与可控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在该体系之下,温和的全球化得到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也随之经历了迄今为止最高速的经济增长。美国在当时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对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恢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由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并非自然使然,相反,它们更像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必须得到霸权国的支持才能长期维持。就像英国在“一战”以前那样,美国在“二战”后起到了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

然而,对美国的依赖暗含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潜在的缺陷,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元汇兑本位制的可持续性。1973年,当美元面临贬值压力时,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总统优先考虑美国利益而非全球治理体系。他为了维持美国收支平衡而让美元贬值,并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尽管如此,美国的主导地位仍然存在,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仍得以维持。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摆脱了对贸易、资本和劳动力的限制,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再次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国际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有了大幅度提升。1960年,美国的进出口额只有484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GDP的9%,甚至明显低于美国在第一波全球化期间的水平。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国际贸易水平迅速提高。2015年美国进出口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sup>①</sup>占GDP的比重也在2011年达到31%的峰值。<sup>②</sup>这些数据远高于第二波全球化前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动也显著增强。1970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净流入仅有126亿美元,占当年GDP的0.1%,到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已达到379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增加到2.1%;<sup>③</sup>197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仅为65亿美元,到2015年已增加到3486亿美元。<sup>④</sup>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口流入数量出现了激增。《1965年移民法》通过后,合法移民数量从当年的30万增加到1991年的180万,2015年仍高达105万。<sup>⑤</sup>累计移民数量则更为可观,2015年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口数量已达到4300万人,占总人口的13.5%。<sup>⑥</sup>从贸易、资本和人口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确实经历了一轮快速全球化的进程。

第二波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测算,2013年,商品

①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 S.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Balance of Payments (BOP) Basis,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storical/gands.pdf>.

②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TRD.GNFS.ZS?locations=US>.

③ World Ban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CD.WD?locations=US>,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WD.GD.ZS?locations=US>.

④ World Ban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Outflows”,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M.KLT.DINV.CD.WD?locations=US>.

⑤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able 1. Persons Obtaining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Fiscal Years 1820 to 2015, <https://www.dhs.gov/immigration-statistics/yearbook/2015/table1>.

⑥ U. S. Immigrant Population and Share over Time, 1850-Present, <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programs/data-hub/charts/immigrant-population-over-time?width=1000&height=850&iframe=true>.

与服务出口支撑着美国 1 130 万个工作岗位,占到总量的近十分之一,其中包括制造业四分之一的岗位,而且与出口相关岗位的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3% 至 18%。<sup>①</sup> 特朗普最激烈反对的自由贸易协定,为美国增加了 3 000 亿美元的出口,并支撑着 540 万个工作岗位。<sup>②</sup> 降低关税鼓励进口,一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国内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样化的选择,降低了生活成本。据估计,美国中等收入消费者有 29% 的购买力源自国际贸易,相当于平均给每个家庭每年带来大约 1 万美元的收入。<sup>③</sup>

资本自由流动为美国带来的一个巨大收益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2015 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 5 000 亿美元,但当年美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也高达 3 500 亿美元。美国参与全球化的部分实质是,一方面从欧洲发达国家获取资金,另一方面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购买商品。这样,它既同时增加了贸易和资本,又尽可能维持了国际收支平衡。

此外,过去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移民使美国受益匪浅。移民为美国带来 4 500 万劳动力,抵消了美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移民可以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节省了培养成本,而且欧洲和亚裔移民通常具有较强的企业与创新精神。一方面,大约 40% 的移民只有高中以下学历,他们接手了美国人不愿意干的低技能工作;另一方面,美国又接受了大量的高学历移民,其 29% 的科学家和 50% 以上的科学和工程博士来自于移民。<sup>④</sup>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伴随着美国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明显转变。向自由贸易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平均关税税率的大幅度下降。到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波全球化开始时,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仍保持在 6% 以上,而最近几年已经降低到 1.3%。<sup>⑤</sup>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国签订了众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最著名的是 1994 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伙伴国购买了近一半的美国出口产品。美国还为促进资本流动制定了一系列政

策。在尼克松政府 1973 年放弃美元汇兑本位制后,美元并没有失去首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同时,自由浮动的汇率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动。<sup>⑥</sup>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还陆续取消了新政时期对资本和金融业的一系列管制,各种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不断涌现。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政府在 1999 年取消了新政时期制定的隔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进一步刺激金融业的自由发展,但此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1965 年移民与国籍法》用全球限额制度取代了之前的民族来源限额制度,这一方法造成外来移民激增。《1986 年移民改革和控制法》则大赦了 270 万非法移民。《1990 年合法移民改革法》被认为是一部最宽松的移民法,大大提高了移民配额。至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总统试图用行政命令使 1 100 万非法移民合法化,但共和党建制派虽然赞同自由贸易,却反对放宽移民政策,认为大量非法移民侵占了美国的福利资源,并加剧了对工作岗位的竞争。

全球化的发展还深刻改变了美国的社会观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贸易和资本管制的重视,但这种谨慎态度在 20 世纪

① The Office of the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 "Benefits of Trade," <https://ustr.gov/about-us/benefits-trade#>.

② U. S. Chamber of Commerce, "Opening Markets, Creating Jobs: Estimated U.S. Employment Effects of Trade with FTA Partners", May 14, 2010, p.11. [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legacy/reports/100514\\_ftajobs\\_full\\_0.pdf](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legacy/reports/100514_ftajobs_full_0.pdf).

③ The White Hous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US Trade, pp.3, 5.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cea\\_trade\\_report\\_final\\_non-embargoed\\_v2.pdf](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cea_trade_report_final_non-embargoed_v2.pdf).

④ The White House, "The Economics of Commonsense Immigration Reform from 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3", p. 12.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fact\\_sheet\\_the\\_economic\\_case\\_for\\_commonsense\\_immigration\\_reform\\_from\\_the\\_erp\\_2013\\_final.pdf](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fact_sheet_the_economic_case_for_commonsense_immigration_reform_from_the_erp_2013_final.pdf).

⑤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 Trade Policy since 1934", p. 59,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us\\_trade\\_policy\\_since1934\\_ir6\\_pub4094.pdf](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us_trade_policy_since1934_ir6_pub4094.pdf).

⑥ 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而对资本流动施加严格限制,而 1973 年后,美国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放弃了汇率稳定。

70年代后逐渐被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70年代兴起并成为主流经济理论,深度的国际分工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政府监管则成了首要障碍。这种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为解决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的经济问题而提出“华盛顿共识”,它鼓励各国尽可能实行开放和私有化。

新政后一贯主张政府监管的民主党也在90年代走上“第三条道路”,部分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比尔·克林顿可谓美国的“全球化总统”,他将全球化视为解决美国问题的首要方案,认为美国必须赞同全球化不可阻挡的逻辑。<sup>①</sup>克林顿政府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urence Summers)是美国鼓吹全球化的旗手之一。他推动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支持对华尔街和金融衍生品去管制。此后,他还成为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是全球化的最主要鼓吹者之一。他在1999年断言“亨廷顿们错了”,未来世界的核心问题将是全球化而非“文明的冲突”。<sup>②</sup>他相信全球化是一列没有引擎的高速火车,任何不好好坐车的人都将抛弃或被碾压;政府的工作是向民众解释全球化的好处,同时缓和它带来的短期冲击;只有短视的、愚蠢的或无准备的人才会反对全球化,他预计对全球化的抵制将主要来自穷国。<sup>③</sup>

美国精英普遍相信全球化能显著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美国会在这场全球经济浪潮中再次获胜。经济和人口全球化的发展还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的流行。奥巴马2008年在柏林声称,他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来发表演讲的。<sup>④</sup>

然而,在美国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下,一直潜藏着一股反对的暗流。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反全球化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等群体参与的左翼运动,但最近一些年来,右翼民粹主义者成了反全球化的主力。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将移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当做首要攻击目标,而且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大选。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桑德斯(Bernard Bernie

Sanders)也竭力抨击自由贸易,连一贯支持全球化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都不得不承认,美国还没有为21世纪的全球化做好准备。<sup>⑤</sup>

## 二、美国转而成为全球化反对者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40年后它们却成为全球化的强烈反对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拥护者。理解这种反差的关键是要分清全球化的具体受益者与受害者。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人口迁徙固然能提升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但它们也必然会损害一些国家和一国国内部分群体的利益。全球化并非没有代价。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不需要生产所有各种产品,而应集中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来增加生产总量,从而提升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开展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和收入的增长。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念无疑具有其合理性,过去半个世纪里世界贸易量和经济总量同时快速增长,就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自由贸易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使许多美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招

① Bill Clinton, “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San Francisco”, February 26, 1999,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7170>.

②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赵绍棣、黄其祥译:《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③ George Packer, “Hillary Clinton and the Populist Revolt”, *The New Yorker*, October 31, 2016,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10/31/hillary-clinton-and-the-populist-revolt>.

④ Barack Obama, “Full Script of Obama’s Speech”, July 24, 2008, <http://edition.cnn.com/2008/POLITICS/07/24/obama.words/>.

⑤ George Packer, “Hillary Clinton and the Populist Revolt”, *The New Yorker*, October 31, 2016,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10/31/hillary-clinton-and-the-populist-revolt>.

致他们的反对。第一,自由贸易可能导致某些群体失业和收入下降。当资源在全球配置、分工在全球展开时,市场竞争压力会比仅在本国内大得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企业纷纷外迁或外包,这样美国劳动者就必须与待遇比他们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进行竞争。来自其他国家的市场竞争加速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尤其是白人蓝领集中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通常认为,受到外国竞争冲击的劳动者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其他优势行业,从而缓解对其收入的不利影响。但现实却是,受冲击者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转换行业或迁居的成本往往很高,结果导致现实劳动力市场的很大摩擦。因此,外国竞争的后果很可能是受冲击地区失业率升高和居民收入减少。

有研究表明,美国的部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确实受到自由贸易的冲击。假如平均到每个美国工人身上的中国进口额提高1000美元,当地的就业人数将会减少0.6%(制造业减少0.18%),失业率将上升0.22%,劳动参与率将下降0.55%,而且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更少的工人受到的冲击更大。<sup>①</sup> 特朗普曾引用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宣称“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美国几乎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损失了5万家工厂。”<sup>②</sup>此外,按照该智库的说法,自2001年至2013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使美国损失了32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240万个来自于制造业。<sup>③</sup> 仅2015年,美国与TPP各国的贸易逆差就使美国损失了2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110万个来自于制造业。<sup>④</sup>

第二,贸易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一点往往被其经济效应所掩盖。自由贸易在原则上能提高全球总产出和总体福利,但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它所带来的广泛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由于流动资本重新部署了世界经济中的职业和生产,贸易强化了国际竞争压力,全球金融限制了国家的福利和再分配能力,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经济

不平等。<sup>⑤</sup>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特朗普大选获胜后揭示了这一问题,他指出,近年来,推动全球增长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层层惠及所有人口。随着企业为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而进行外包,并尽可能提高效率,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失去了工作。”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两年后的欧元危机,更加剧了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这两场危机中,美国的自由金融市场以及欧洲的欧元和管理内部人口流动的申根体系等政策,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都迅速崩溃。这些失败的代价再一次更多地由普通工人、而非精英自身所承担。”<sup>⑥</sup>

此外,随着贸易越来越自由,其经济效益会日益减弱,而分配效应会越来越增强。当市场竞争从国内扩展到全球时,获利和受损的具体人群也会发生变化。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上阶层和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而最大的受损者却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群体,他们依然无法摆脱极端贫困。<sup>⑦</sup>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68年到2014

① David H. Autor,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No. 6, 2013, p. 2143.

② Donald J. Trump's Vision, <https://www.donaldjtrump.com/policies/trade>.

③ Will Kimball and Robert E. Scott, “China Trade, Outsourcing and Job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December 11, 2014,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trans-pacific-partnership-currency-manipulation-trade-and-jobs/>.

④ Robert E. Scott and Elizabeth Glas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urrency Manipulation, Trade, and Job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March 3, 2016,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trans-pacific-partnership-currency-manipulation-trade-and-jobs/>.

⑤ [英]戴维·赫尔德、[美]安东尼·麦克格鲁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⑥ Francis Fukuyama, “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1,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6a43cf54-a75d-11e6-8b69-02899e8bd9d1>.

⑦ Christoph Lakner and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5, p. 14, [https://www.gc.cuny.edu/CUNY\\_GC/media/LISCenter/brankoData/wber\\_final.pdf](https://www.gc.cuny.edu/CUNY_GC/media/LISCenter/brankoData/wber_final.pdf).

年,美国最富裕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从42.6%增加到51.2%,而其余四个五等分组的比重却都逐渐减少,而且越贫穷的阶层降低得越多。<sup>①</sup>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言,自由贸易实际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和阶级分裂。美国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相对受损者,因而他们也是反对自由贸易最激烈的群体。

第三,在自由贸易中,各国成本计算标准的差异会引发冲突。自由贸易建立在比较成本的基础之上,但生产成本的计算标准在各个社会可能很不相同。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往往只考虑以市场价格计算的直接成本,而忽略生产的外部性,例如环境污染、生产安全、劳工保护和社会福利等。在发达国家,这些外部要求都很高,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全球化深入发展后,发达国家的企业很容易迁移到外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或以此迫使本国政府或劳动者降低标准,例如降低工人工资、打击工会组织、减少社会福利、放松环保监管、对企业和富人减税,等等。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对美国社会标准和规则的挑战也是其遭到反对的原因之一。美国对挑战的回应是,奥巴马政府在TPP规则谈判中,为其制定了很高的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而TPP最后被反全球化的特朗普总统全盘推翻。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使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当资本收益率快于经济增长率时,不平等现象就会加剧。资本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更加不平等,越富裕的群体其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例越大。大资本往往有更高的资本收益率,进而导致资本额与不平等呈正相关。20世纪前半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剧烈的经济政治冲击,资本遭到严重破坏,结果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经济不平等得以缓解。20世纪后期,资本开始快速自我增长。尽管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但到2010年资本繁荣程度已达到1913年后的最高点。<sup>②</sup>

资本收入比重上升的一个原因是,金融全球

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更有效的配置,从而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与此同时,金融全球化也极大地提高了资本所有者的收益,使得富人的收入和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在当今美国,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人数极少的群体手中,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拥有全国50%的资本收入,而收入较低的50%的人群几乎没有任何资本收入。美国最富裕的1%家庭的实际收入在20世纪30至70年代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而从70年代后期开始急剧增长,其速度远远高于排在其后的99%的家庭任何时期的收入增长速度。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的财富份额在1978年降到7.1%的最低点,以后便迅速上升,到2012年高达22%,重新回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平。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中下层9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居民总财富比重的变化趋势却差不多完全相反。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9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相等。<sup>③</sup>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导致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68年的0.39上升到2014年的0.48,几乎高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sup>④</sup>从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来看,近年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和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对华尔街和国际资本的批评并非没有缘由。

相对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全球化中的人口跨国迁徙对美国的冲击更大。与自由贸易类似,移民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国境使得国际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分散,资历相近工人的工资在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有天壤之别。一名工人只要跨越国境,工资

①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4", pp. 30-34, <https://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15/demo/p60-252.pdf>.

② [法] 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2页。

③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Main Data", <http://gabriel-zucman.eu/uswealth/>.

④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Income Tables: Income Inequality", <https://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inequality/>; 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 <http://www.oecd.org/social/income-distribution-database.htm>.

就可能提高许多倍。这种差别诱使很多低收入国家的人千方百计地、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移民到发达国家。<sup>①</sup> 移民就像商品交换一样能够提升全球总体福利,使移民者和其所移民国家双方都受益,但它也会像自由贸易一样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受损。

首先,外来移民可能冲击国内劳动力市场,加剧竞争,拉低工资,导致失业。虽然总体来说,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就业市场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移民多从事本土居民不愿意干的低技能工作,但在经济衰退时本土居民容易将自身失业问题归咎于移民。<sup>②</sup> 同时,有研究表明,移民对低学历本土就业者的工资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大约使其降低了4.7%。<sup>③</sup> 其次,外来移民可能引发本土居民心理失衡,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进而激发本土主义和种族歧视。反对移民的美国人特别反感移民占用他们的福利资源,他们相信那些移民是插队者和懒惰者,以牺牲底层白人为代价而得到社会优待,并认为民主党在此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sup>④</sup> 第三,外来移民可能导致过度的社会多元化,引发国家认同危机。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曾对此提出警告,他直言美国的国家认同已经受到大规模的拉美裔移民的威胁,并称美国有可能分化成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第四,外来移民还可能带来更多的犯罪活动和安全隐患。历史上,美国政府和民众曾担心移民可能把激进的政治思想和运动带入美国。当前,许多美国人则担心移民会带来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特朗普即以此为要求限制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遭到反对的原因与第一波全球化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第一,全球化发展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存在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在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能占上风。第二,全球化具有再分配效应,会进一步造成经济不平等,而政府却往往对此认识不足,未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第三,人口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可能造成本土居民失业和收入下降,引起社会冲突,甚

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 三、美国的反全球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美国白人蓝领和中产阶级由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受到全球化的损害,便诉诸于政治手段,靠权力来维护在他们看来是自己的应得之物,保护自身免遭进一步的损害。他们的力量虽无法逆转全球化进程,却足以对美国甚至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美国反全球化浪潮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结果便是特朗普的当选。与其他总统参选人不同,特朗普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化,激烈地攻击自由贸易和外来移民。他声称:美国的“政客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全球化……全球化让金融界的精英们赚得金银满盆,但是它带给数千万美国工人的却只是贫穷和心痛。”<sup>⑤</sup> 他还宣称将绝不会再让美国或它的人民屈服于全球化,其手段将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 TPP),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 NAFTA)等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等等。特朗普还要求遣返美国的非法移民,在美墨边境修建围墙,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特朗普的当选得到美国反全球化群体的普遍支持。特朗普成功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他

① [美]丹尼·罗德尼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26页。

② Adam Looney, Michael Greenstone, Michael Greenstone and Adam Looney, “What Immigration Means for U.S. Employment and Wages”, Brookings Institute,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jobs/2012/05/04/what-immigration-means-for-u-s-employment-and-wages/#cancel>.

③ George J. Borjas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Evolution of the Mexican-Born Work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George J. Borjas ed., *Mexic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13-15.

④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6, pp. 137-139.

⑤ “Full Transcript: Donald Trump’s Jobs Plan Speech”, *Politico*, June 28, 2016,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6/06/full-transcript-trump-job-plan-speech-224891>.

得到了中下层白人的支持。这一群体非常关心自由贸易、移民和恐怖主义袭击问题。<sup>①</sup>虽然他们只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但他们构成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半壁江山,确保他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一个稳固的民意基础。特朗普在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中的得票率领先希拉里 39 个百分点,而在 2012 年选举中,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在这个群体中的得票率仅领先奥巴马 25 个百分点。<sup>②</sup>第二,特朗普得到了中西部各州白人蓝领的支持,这个群体曾是民主党的核心选民,但由于感到深受自由贸易之害,他们逐渐转向共和党。这使特朗普能以不到 10 万张的微弱普选票优势,颠覆掉三个传统的蓝州——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从而决定性地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因此可以说,特朗普的当选是那些自认为深受自由贸易之害的中下层白人的胜利,他们发现自己在自由贸易和外来移民的冲击下,经济上受到损害,社会地位也在下降。特朗普则充分利用了他们经济与种族文化上的焦虑感。

深度全球化反而激起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当前美国政治归于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抗,或许失之于简单,却足以说明很多实质性问题。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后者至今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是如此,而全球治理尚无法突破民族国家的界线。因此,每当全球化进程危及民族国家利益时,后者的力量几乎总能占上风。20 世纪 30 年代是如此,当今的美国还是如此。特朗普宣称“民族国家仍然是幸福与和谐的真正基础”,<sup>③</sup>并明确地把“美国优先”当做其信条。他在就职演说中直言:“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各国皆有权将其利益置于首位。”<sup>④</sup>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曾激发很多人的乐观主义情绪,就像是欧盟的发展曾经带来的乐观情绪一样,他们以为国家主权和民族情绪都会逐渐弱化,身份认同将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次国家或全球性层面上来。但现实却远非如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英国脱欧、欧洲各国极右势力的兴起,都证明深度的全球化反而会激

发民族主义情绪。

保护主义政策将成为美国应对全球化风险的一种手段。美国有悠久的保护主义传统,从 19 世纪初一直到二战时,美国都一直用极高的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历史表明,当美国自身利益受损时,它会毫不吝惜使用保护主义政策。当第二波全球化的副作用凸显时,保护主义在美国也应运而生。特朗普倾向于用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来拯救美国的经济。与自由贸易所倡导的开放与合作相反,特朗普声称:“只有保护,才能带来繁荣富强。”<sup>⑤</sup>皮尤公司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 2009 年以来多数美国人仍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最近两年反对的比例从 30% 上升到 39%。以往多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人现在有 53% 的反对它,而以往多反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人现在却有 56% 的支持它;特朗普的支持者对自由贸易的反对最为激烈,比例高达 67%。<sup>⑥</sup>大选的出口民调也显示了类似的现象:42% 的投票者认为国际贸易夺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而且投特朗普票的人中 64% 的人持此观点,相反,只有 39% 的投票者认为国际贸易为美国创造了工作岗位。<sup>⑦</sup>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特朗普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在美国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

大规模移民浪潮已经激发了美国本土主义

<sup>①</sup> Pew Research Center, “Top Voting Issues in 2016 Election”, July 7, 2016,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7/07/4-top-voting-issues-in-2016-election>.

<sup>②</sup> Exit Polls 2016, <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

<sup>③</sup> “Donald J. Trump Foreign Policy Speech”, April 27, 2016, <https://www.donaldjtrump.com/press-releases/donald-j.-trump-foreign-policy-speech>.

<sup>④</sup> Aaron Blake, “Donald Trump’s Full Inauguration Speech Transcript, Annotated”,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7/01/20/donald-trumps-full-inauguration-speech-transcript-annotated/?utm\\_term=.5fb91318583c](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7/01/20/donald-trumps-full-inauguration-speech-transcript-annotated/?utm_term=.5fb91318583c).

<sup>⑤</sup> 同②。

<sup>⑥</sup> Bruce Stokes, “Republicans, Especially Trump Supporters, See Free Trade Deals as Bad for U.S.”, March 31, 2016,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3/31/republicans-especially-trump-supporters-see-free-trade-deals-as-bad-for-u-s/>.

<sup>⑦</sup> 同②。

的复兴。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但反移民情绪在美国出现非新教徒和有色人种的大规模移民后周期性地爆发了。美国历史上的反移民本土主义运动表面上多出于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原因,担心美国社会特性会遭到异质性移民的冲击,但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原因也掺杂在其中。较近的例子是,新一轮的本土主义在2009年兴起的右翼民粹主义茶党运动中明显显现出来。反移民是茶党的核心议题之一,他们将移民斥为懒惰的、有罪的和危害社会的占便宜者。茶党分子在阻挠奥巴马的移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①</sup>

特朗普以更加极端的形式将反移民议题引入2016年大选和美国政治生活中,并将驱逐非法移民作为执政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与美国以往的本土主义运动类似,特朗普反移民的理由也掺杂着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经济竞争、种族文化等不同的成分。他声称穆斯林移民给美国带来了恐怖主义活动,墨西哥移民带来了犯罪活动,还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2016年大选的出口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非常关心移民问题,在将移民视为美国最重要议题的选民中,64%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且在赞同驱逐非法移民的选民中,83%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sup>②</sup>

美国的本土主义运动往往带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色彩。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的言论使以往受到抑制的非主流右翼进入主流政治视野。特朗普的白宫首席战略师和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非主流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派人坚持白人至上,排斥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频繁地抨击全球化,宣扬全球主义阴谋论。<sup>③</sup>

全球化还引发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冷战的结束曾给美国带来“历史终结”的乐观憧憬,但在仅仅20年之后,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诸多弊端便暴露无遗。经济不平等、中产阶级衰落、白人蓝领失业、国家认同分裂、恐怖主义袭击等许多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引起的。这些短期内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加剧了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分裂。两党分别代表在全球化中受益和受损的群体:具有民族主义价值观的白

人精英与中下层白人结盟,他们是全球化的相对受损者,构成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具有世界主义价值观的白人精英与少数族裔、外来移民联盟,他们是全球化的相对受益者,构成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利益分歧造成两党在观念和政治上的尖锐对立,这会严重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损害民众对政府和民主制度的信任,而且还会反过来降低政府应对全球化所产生的副作用的能力。根据盖洛普的民调,美国民众对国会的信任程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最近几年一直不到20%,最低时只有9%。<sup>④</sup>美国全国选举调查(ANES)得出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1966年曾达到61%,之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到2012年仅为22%。<sup>⑤</sup>当民众不再信任政府,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可能诉诸于民粹主义这种非常规的民意表达方式,并要求推行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极端政策。

民主制度的关键在于赢家与输家的妥协,政策的受害者应能获得充分的补偿。但在当今的美国,很难想象当政者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世界主义的精英不能理解中下层白人的思维和举动,直接将其贬低为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如希拉里·克林顿将特朗普的一半支持者斥为“可悲的”。另一方面,中下层白人固然受到全球化的损害,但他们远非美国最贫困、最受歧视的群体,占美国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经济社会地位,通常比中下层白人更低。而且,许多白人也拒绝放弃他们一直坚持的种族优越感和“美国例外论”,不愿接纳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虽然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

<sup>①</sup> 参见付随鑫:“从右翼平民主义的视角看美国茶党运动”,《美国研究》,2015年第5期,第96页。

<sup>②</sup> Exit Polls 2016, <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

<sup>③</sup> Liam Stack, “Globalism: A Far-Right Conspiracy Theory Buoyed by Trump”, November 14,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15/us/politics/globalism-right-trump.html>.

<sup>④</sup> Gallup, “Congress and the Public”, <http://www.gallup.com/poll/1600/congress-public.aspx>.

<sup>⑤</sup>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Trust in Government Index 1958–2012, [http://www.electionstudies.org/nesguide/toptable/tab5a\\_5.htm](http://www.electionstudies.org/nesguide/toptable/tab5a_5.htm).

很多美国人都宁愿相信,成熟的美国民主制将他作为总统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但全球化所引发的这些经济与社会危机将对美国自由民主制的韧性与稳定性形成严峻考验。

美国的反全球化还可能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危及当今的世界秩序。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反全球化行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就得到过证明: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加速了自由贸易体系的崩溃。虽然80多年后各国能从以往的灾难中汲取教训,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也更为发达,但美国的反全球化政策还是可能危及当今的世界秩序。自1945年以来,促进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是由美国创建的自由世界秩序,而一个开放贸易和投资的体系之正常运转,依靠的是美国的霸权力量。如果美国带头采取行动改变这一体系或阻挠其发挥作用,世界范围内会有很多力量乐于响应或“配合”其行动,结果可能引发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螺旋式下行。<sup>①</sup>

在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帮助下上台的特朗普,在其主要内外政策方面都与主张美国引领全球化的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逆向而行。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美国经济第一、贸易第一、就业岗位第一。凡是危及美国贸易和就业的国家,都被视为美国利益的危害者;对所有国家的态度,也都要以此衡量。他试图大幅修改甚至推翻过去70年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执行副总裁马库斯·诺兰德(Marcus Noland)认为,特朗普头脑里根本没有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他厌恶任何经济学理论,持有某种重商主义观念,认为出口多、进口少是获利的象征,实际上把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看做是零和游戏。<sup>②</sup>

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兑现其在大选中的承诺,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不断口头施压,要求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停止在海外投资建厂,将生产迁回美国。特朗普多次声称中国损害了美国经济,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商品征

收45%的关税。美国商务部正在制定向中国企业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措施。美国的这些行动将对国际贸易体系造成重大影响。

特朗普对全球治理缺乏兴趣,蓄意忽略许多全球性问题。例如,特朗普宣称气候变化是中国制造的骗局,反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此相应的是,他要求重新发展化石能源,取消对美国能源生产的限制。这些做法背离了国际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将削弱各国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共同努力,并将影响国际能源的供给和价格。

特朗普持强烈的反移民和反难民态度,使他上任不到20天就签署了《促进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的总统行政令,以加强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并签署了题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总统行政令,禁止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国家的普通公民进入美国。这招致美国国内外接连爆发激烈的政治抗议、法律诉讼和外交冲突。最后国土安全部根据最高法院法官做出的违宪裁决,宣布全面暂停执行这一行政令。特朗普坚持要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围墙,以阻止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根据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全国各地正在采取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拘捕非法移民。但这一措施已经引起谷歌、微软、苹果等电子产业中大型跨国公司的担忧,因为它们的雇员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外来移民。微软的印度裔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封内部邮件,表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移民对整个微软都至关重要。”而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othy Donald Cook)则在一封给员工的内部信件中说,“苹果坚信移民的重要性——无论对我们公司还是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均是如

<sup>①</sup> Francis Fukuyama, “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1,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6a43cf54-a75d-11e6-8b69-02899e8bd9d1>.

<sup>②</sup> 来自作者在美国进行调研时,库斯·诺兰德与作者的谈话。

此。没有移民,就没有苹果,遑论后来的繁荣与创新”。<sup>①</sup>

美国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的一系列逆全球化而动的对外政策,还意味着它将放弃许多国际责任,而这将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这种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出现过,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其称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马歇尔计划的构想者之一,他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多灾多难的原因是,虽然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但却未能接替英国扮演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结果导致全球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sup>②</sup>

#### 四、结论与思考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是全球化进程的引领者与推动者,但如今却受到其副作用的严重影响,转而成为它的反对者和阻挠者。其中的原因与教训令人深思。

从美国所经历的两次全球化进程、美国对全球化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与政治影响来看,美国曾作为主要角色之一深度参与第一波全球化进程。然而,一旦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能承受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和外来移民的冲击,它便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迅速转向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一次全球化进程的中断。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第二波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成为引领者与推动者。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如今全球化对美国的副作用逐渐显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的制造业衰败、就业岗位丧失、收入下降、经济不平等、政治冲突、国家认同危机、犯罪活动和国家安全威胁等严重问题。这些社会危机激发了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潮流,催生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政策。而反全球化的特朗普新政府准备采取的一系列抵制措施,将可能削弱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和现存的国际秩序。

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全球化并非自然使然,既非不可避免也非不可逆转。自由贸易也不一定是国际交往的常态,而是霸权国的游戏。正如一个国家内部任何遭受经济损失的群体都试图寻求政治保护一样,在全球化过程中竞争失利的群体和国家也会诉诸政治手段。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当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时,后者的利益必然占上风。如果忽略全球治理的这一局限,只会加剧全球化的脆弱性。一方面,深度的全球化会损害民族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民主性,从而削弱它应对全球化副作用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全球化日益深入时,国内和国际治理的方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推进全球化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前提应当是各国,特别是主要推进者,努力改善国内治理。良好的国内治理能缓解全球化的副作用,而失败的国内治理会带来对全球化的反弹和巨大阻力。

全球化固然能提升全球总体福利,但也会造成新的受害者。如果完全忽视他们的诉求,反全球化的情绪就会逐渐积累,最终可能爆发出来。但如果放任甚至迎合反全球化情绪,则可能制定短视、狭隘和自私的政策,破坏正常的国内和国际秩序。受害者的看法也并非总是理性和客观的。白人蓝领的损失恐怕很难说主要是由全球化引起的,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才是其主要原因。<sup>③</sup> 他们所要求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其境况不能说毫无帮助,但可能同时危害国内和国际秩序。这些自利政策曾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造成严重的灾难,当今各国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世界各国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 1970 年到 2008 年美国金融危

<sup>①</sup> 引自“特朗普下了一道‘移民禁令’,整个硅谷都坐不住了”,搜狐网,2017 年 1 月 30 日, <http://mt.sohu.com/20170130/n479724100.shtml>。

<sup>②</sup> Joseph S. Nye, Jr.,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9,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

<sup>③</sup> U.S. Chamber of Commerce, “Opening Markets, Creating Jobs: Estimated U.S. Employment Effects of Trade with FTA Partners”, May 14, 2010, pp. 7–8. [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open\\_door\\_trade\\_report.pdf](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open_door_trade_report.pdf)。

机,全球商品和服务产出翻了两番,使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不仅包括中国人和印度人,还包括生活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sup>①</sup>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美国的反全球化也将给中国带来重要影响和启示。一方面,中国还会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体量和经济发展需求使其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美国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还有能力促进未来的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开放经济的重要推动者。另一方

面,全球化体系是一项庞大的公共产品,需要强国甚至霸权国的大力推动才能得到维持,因此在当今世界,美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关键。如果中国想要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需做长远的努力,且需量力而行。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和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终有一天,当前美国在全球化中遇到的困境也会成为未来中国面临的问题,因此,美国的经验教训亦应成为中国今后的借鉴。

编辑 李 亚

## 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U.S. and It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ZHOU Qi<sup>1</sup> FU Suixin<sup>2</sup>

(1.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100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U.S. from three aspects: free trade, capital flow and immigration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 major booster and beneficiary of globalization, the sid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have posed more challenges to the U.S., resulting in opposition of the middle-and-lower-class white people and Trump's win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Nationalism, protectionism and nativism inspired by anti-globalization could jeopardize the established U.S. institu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case of the U.S. illustrates that globalization is shaping the world in a paradoxical way: it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while its side effects could cause a rebound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from its former major boosters. Therefore, the sid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anti-globalization should attract enough attention.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anti-globalization; free trade; immigration; Trump

<sup>①</sup> Francis Fukuyama, "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1,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6a43cf54-a75d-11e6-8b69-02899e8bd9d1>.